【人文经济学与区域发展专题】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区域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纪小乐 魏建

摘 要：推进区域深度融合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夯实全国统一大市场根基的关键环节，而传统区域融合发展范式偏重以政策破除市场分割，推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流通，普遍忽略人文要素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深层影响。人文经济学从生产联结、交易成本、文化认同、区域融合四重机制搭建完整分析框架：以合作加强经济与文化交流，以长期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强化主体信任、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形成文化认同和发展共识，最终实现高水平的区域融合。这为破解我国要素市场分割、产业同质化竞争、跨域协作短期化等现实难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依托人文赋能逐步实现从政策驱动型区域融合转向内生共生型区域融合，最终构筑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区域融合发展共同体。基于人文经济学理论，系统梳理区域融合发展的理论渊源、运行机理、现实阻滞与优化路径，既是丰富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学术需要，也是完善高水平区域融合落地机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现实诉求。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区域融合发展；生产联结；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5-0026-10 **收稿日期**：2026-07-26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文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5ZXZD001)；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项目“人文经济学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25AWTJ04)；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苏州人文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研究”(Y2026LX111)；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山东乡村全面振兴研究”(25CJJJ05)。

作者简介：纪小乐，女，山东大学人文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社副编审，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济南 250100)。

魏建，男，山东大学人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济南 250100)。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的重大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体制机制协同为保障，推动区域间互融互促、互利共赢，拓展国内大循环空间”，这要求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和各类隐性市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平等交换与双向自由流动，依托产业协同、文化共建、利益共享推进全国层面的全域深度融合。

进入新时代，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使我国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单点极化的粗放发展，进入全域协同、区域联动、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顶层政策引导与市场力量的双重驱动下，我国区域融合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卢伟等，2025)。跨区域交通、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基本实现，

硬件联通网络全域覆盖；产业链、供应链跨区域延伸布局，产业协作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人才、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以及数据、碳资产等新型要素的跨区域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各地在市场监管、营商环境、产业扶持等领域的政策对接持续深化，物质层面的生产联结已具备坚实基础。但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现实成效来看，要素流动不畅、区域发展极化、跨区域合作稳定性不足等深层次问题仍存在。当前区域融合呈现出明显的“浅表化”特征：地区协作行为更多依靠短期政策红利驱动，部分地区的市场自发协同、社会主动共建的内生机制尚未形成；硬件联通之外的软性融合严重滞后，行政边界演化而来的认知边界、文化边界、信任边界依旧存在。这种软性边界是以行政边界和地理分界线为基础，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要素流动边界（纪小乐等，2019）、制度规则边界（陈尧，2025）、文化认知边界（李琳等，2016）与社会交往边界（陈旭等，2025）。传统区域政策多聚焦于降低地理和政策层面的有形壁垒，却忽视由长期发展中产生的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精神需求等要素对区域发展产生的影响（安晓明等，2025）。即便交通、产业、市场实现表面互通，差异化的治理文化、价值观念、行为逻辑依然会推高协作成本，阻碍深度融合。这是区域融合发展中“联而不通、合而不深”的根本原因。

人文经济学这一理论命题，立足人本视角，回归经济发展服务于“人”这一终极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的汲取与创造性转化，是对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人文”思想的延续与升华（赵麦茹等，2025）。传统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抽象“理性经济人”为核心假设，构建起以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将文化、价值、伦理、社会关系等人文要素视作外生变量，难以完整解释真实世界中复杂多元的经济行为与区域发展规律（罗卫东，2025）。与之不同，人文经济学重构经济分析的底层逻辑，将完整的“社会文化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把文化认同、社会信任、人际网络、公共价值共识、伦理规范、历史文脉等人文要素内生纳入经济系统全过程分析，揭示文化赋能经济、经济滋养文明的双向作用机理，跳出“唯资本、唯增长、唯效率”的物化分析桎梏，形成兼顾物质增长、精神富足、社会和谐的复合型多元分析体系（魏建，2024）。人文经济学的提出为当前我国区域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提供了系统化、学理化的理论指引：它明确人文要素是驱动区域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核心动力，而非依附于物质发展的附属品。区域融合不能仅停留在产业链、基础设施等物质层面的互联互通，更要依托共通的文化根脉、价值共识、社会信任搭建深层协作纽带，依靠人文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凝聚发展共识、培育持久内生增长动能。

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背景，本文以“生产联结建立—交易成本降低—人文认同构建—区域深度融合”为核心逻辑主线，剖析人文经济学视域下区域融合发展的内在运行机理，梳理当前发展中的现实堵点，探索经济与文化的交融机制，并提出针对性实现路径，以期推动区域融合发展从行政外源驱动转向人文内生驱动，从而实现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和人文关怀的区域发展模式。

二、人文经济学视域下区域融合发展的现实问题

基于人文经济学理论以及国内城市群发展实践来看，当前我国区域融合发展整体处于“生产联结初具规模、人文认同相对滞后”的状态。物质层面的产业联动、要素流通、基建互通已形成格局，但人文层面的理念共生、文化互鉴、信任共建、共识培育存在明显短板。

1. 地方政府的“经济人”内核，导致发展理念本位固化

市场分割是影响区域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认为中国市场分割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现象，而地方政府是导致“块块分割”的重要原因（银温泉，2001），其本质源于地方政府在长期发展中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经济人”内核。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提出的“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周黎安，2007）认为地方政府官员从自身利益出发，通过发展经济实现经济和政治收益，由此激发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潜能。而这种对政府能力的充分运用源于各级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管理和运行经济的权力，并且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下不断强化，固化了区域间利益分割格局。

属地化行政管理体制与以GDP为核心的传统

政绩考核体系，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思想，即政府行为决策以本地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而非区域整体收益的最大化，这是制约区域融合发展的根源性矛盾（刘志彪，2024）。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将辖区经济增长、税收增加、就业保障作为首要目标，在区域协作中形成“重本地、轻全域，重短期、轻长期，重竞争、轻合作”的行为逻辑。在这一行为逻辑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决策行为往往偏离区域融合发展目标，阻碍区域经济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致使市场主体的生产、投资、流通和消费行为被政策扭曲，难以发挥经济规模效应和促进产业密切协作。此外，在推进区域融合发展时，地方政府普遍将重心放在产业招商、项目落地、基础设施建设等看得见的政绩指标上，人为设置市场准入、要素流动的隐形行政壁垒，割裂全域要素循环链条。

从人文经济学视角看，这种以经济增量为核心的正式制度框架存在明显工具理性偏差，制度设计过度侧重经济规模指标，将经济增长视作发展终极目标，忽略区域发展的人本价值底色。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围绕属地短期利益展开，并未将全域居民福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纳入决策核心标尺，利益分割的制度根源持续弱化区域融合内生协同动力。

2.行政分割长期演化形成地域认知隔阂障碍

若地方政府的财税、考核等正式制度是引发区域融合阻滞的显性硬性约束，那么长期行政属地化治理所沉淀形成的行政文化、治理逻辑、地域认知差异，则是难以通过政策调整快速消解的软性隐性障碍，构成跨区域深度协作的认知隔阂，属于非正式制度层面的发展阻滞。

长期分治的行政格局塑造了差异化的地方行政文化与固定办事逻辑。各行政区在数十年地区“本位主义”治理进程中，逐步形成适配本地发展路径的政策制定模式、政务办事流程、市场监管尺度、政企互动方式。即便国家出台统一的区域协同政策或产业发展政策，不同地区基于固有行政思维，对同一政策文件的解读标准、落地节奏、执行力度也存在显著分歧。例如，同样的产业扶持政策，发达地区侧重科创配套，欠发达地区偏向低端产能补贴；在市场监管领域，各地对同类行业的合规判定标准不统一，企业跨区域经营需要适配多重差异化政务规则，大幅抬升企业经营的时间与制度成本。这种固化行政思维具备路径依赖特征，很难随顶层政策调整快速改变，长期造成区域间政务协作沟通摩擦，这也导致了官员异地任职等政策难以发挥预期效果。

行政分治长期沉淀还催生了地方本位认知偏见，形成天然地域认知隔阂。各级治理主体长期以单一行政区视角看待发展问题，缺少“全域共同体”思维惯性，潜意识将其他城市视作资源、资本、人才的竞争对手，而非产业链互补的协同伙伴。即便硬件交通、产业园区实现互通，各地政府、市场主体、社会公众依然存在地域猜忌，对异地企业、外来项目设置隐性信任门槛。这种认知隔阂独立于财税、考核制度之外，部分地区即便具备全域协作的利益空间，治理主体也会受固有地域偏见影响，主动回避深度长期合作，仅开展短期、浅层次项目对接。

认知隔阂进一步放大区域融合对外力行政推动的依赖程度。在固有属地认知主导下，跨区域协同缺乏自发合作意愿，仅在上级考核施压、专项政策红利阶段主动推进协作；一旦行政约束弱化、政策周期结束，原有认知偏见会再次主导地方决策，跨域协作迅速放缓甚至停滞，难以形成自主、可持续的内生融合动力。不同于财税、考核等可通过制度改革优化的显性障碍，行政文化、认知观念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具备极强黏性，只能依靠长期常态化人文交流、治理互鉴逐步消解，这也是当前我国区域融合“联而不通、合而不深”的深层人文根源。

3.文化交流浅层化，地域隔阂长期存在

我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域拥有独特的历史文脉、民俗风情、生活方式与治理文化，天然形成差异化的区域文化。依据制度经济学理论，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性，一旦形成便会长期影响区域主体的行为选择。在区域融合进程中，自然的文化差异本可成为互补优势，但不完善的交流机制让文化差异演变为认知隔阂与融合壁垒。

当前国内跨区域人文交流普遍存在形式化、碎片化、短期化问题。多数交流活动局限于节庆展演、文体赛事、旅游推介等表层形式，缺乏人才互访、学术共建、治理交流、公众互动等深度场景。交流活动多为阶段性任务，未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长效机制，难以实现理念交融与认知磨合。成渝双

城经济圈的早期发展便是典型案例。重庆大足与四川安岳同属巴蜀文化圈，拥有同源的石刻文化资源，文脉相通、地缘相近，具备天然的人文融合优势。但在双城经济圈建设初期，两地仅聚焦交通修路、产业园区共建等硬件项目，石刻文化资源各自开发、文旅项目重复建设，没有联合打造统一文化IP，也未搭建常态化人文交流平台，这一情况直至近年来才得以改善[①]。

与此同时，部分区域存在文化本位主义，对异地治理模式、文化理念存在排斥心态。各地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治理各自为政，地域隔阂长期无法消解。产业协作、基建互联带来的物质联动优势，无法转化为发展共识和人文共识，区域融合失去社会层面的人文根基。

4.跨域信任体系不完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区域间交易成本既有来自行政壁垒、基础设施差距、政策差异等显性成本，也有信任缺失、文化分歧、机会主义行为等隐性成本。相比于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更加难以解决、影响更为深远，这也是当前区域协作成本居高不下的核心原因。社会网络、信任及规范是区域最重要的社会资本，跨区域信任网络缺失，意味着区域社会资本储备不足，协作效率必然大打折扣（丁焕峰等，2006）。

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通过在主体间建立信任、规范与关系网络，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提高社会效率（Putnam，1993），其受到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对区域结构、区域关系和认知产生影响。社会资本从质量和数量上影响社会中相互交往的组织机构、相互关系及信念，既包括企业等主体的横向与纵向的组织机构之间关系，也包括更大范围内的政府、企业界及社会三方合作的程度。因此可以分为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组织的社会资本和整个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其中整个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可以认为是区域社会资本，是区域中主体实现合作与创新的基础（丁焕峰等，2006）。

而不同地区由于文化与习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区域间的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交互方式、信任模式等存在巨大差异，市场主体开展跨区域合作时，需要付出高昂的信息搜寻、资质核验、风险预判、信任构建等成本。同时，跨区域纠纷调解、失信惩戒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存在违约、恶性竞争等机会主义行为，且难以受到全域约束。高风险、高成本的合作环境，使得跨区域合作存在短期单次博弈倾向，企业开展长期战略性合作的意愿薄弱。众多研究证实了社会信任对企业投资决策（潘越，2009）、企业并购（王艳等，2017）的重要影响。跨区域长期合作的缺乏直接影响了区域微观主体建立生产联结并实现区域融合发展的传导路径，成为区域深度融合的关键堵点。

5.人文融合制度供给失衡，长效协同机制缺失

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二者协同是区域深度融合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区域融合的产业、基建、市场的正式经济制度日趋完善，但服务文化、信任、共识的非正式制度配套严重缺位，人文融合缺乏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经济协作有制度护航，人文共建却处于自由放任状态，人文要素赋能产业、优化成本、凝聚共识的作用无法释放，区域融合始终无法摆脱行政驱动的外部依赖，可持续的内生融合机制难以形成。

一方面，各类城市群规划、跨区域合作协议中，核心内容均围绕产业布局、项目建设、市场规则展开，极少将文化共建、信任培育、认同建构纳入发展目标。另一方面，跨区域人文协同治理主体缺失，没有专门机构统筹区域间文化交流、信任体系搭建、理念互通等工作，各地人文建设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全域联动格局。

三、人文经济学视角下区域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人文经济学拓展了侧重物质要素的传统经济学框架，将文化价值与社会关系等人文要素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位置，强调经济发展的人本价值导向。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被认为是人们普遍具有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Stern，1992）。亨廷顿（2010）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并认为“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人们对进步的想法。文化价值观之所以重要，尤其是因为它们形成人们组织经济过程

所遵循的原则，而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有进步”（亨廷顿，2010）。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区域间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语言表达等文化特征存在极大差异。而这种文化差异在区域交往的过程中不断碰撞，特别是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反复博弈，通过建立信任机制、降低交易成本，逐步建立人文认同，最终实现文化互融，由此建立了区域深度融合。基于人文经济学理论，本文构建了“生产联结建立—交易成本降低—人文认同构建—区域深度融合”的四阶递进机理。这是一个由物质互动逐步升维为人文共生、外源驱动逐步转化为内生动力的动态演化过程。

1.基础载体：生产联结构建全域互动生态

生产联结是区域融合的起点与物质基础，也是人文交流、信任培育的核心实践场景。在传统属地化模式下，行政边界分割经济单元，产业布局本地化、要素流动内部化，区域之间形成“产业孤岛”、“信息孤岛”，主体互动频次极低，人文融合完全缺乏落地土壤。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跨区域产业分工、供应链协作、经贸往来不断深化，叠加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的赋能，生产联结的广度与深度大幅拓展。传统产业的跨区域配套、产能合作，让政府、企业以及相关从业者形成常态化互动；数字技术打破时空限制，数据、技术等要素高频流通，进一步拓宽了互动场景。在政府层面，独具中国特色的资源协调和地区合作的对口支援（钟开斌，2018）、官员异地交流（张军等，2007）、精准帮扶（黄承伟等，2015）等工作模式，同样为跨区域的生产联结搭建了平台。从人文经济学视角来看，生产联结的价值绝不仅限于优化要素配置、提升经济效率，更在于搭建了多元主体的交往平台、多元文化的交流平台以及多元观念的碰撞场景。

以广州–佛山全域同城化为例，广佛地缘相连，同源于广府文化，两地在制造业、商贸服务业形成深度配套的生产联结体系。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跨区域合作常态化，政务部门因产业对接频繁交流，普通民众因就业、消费实现跨区域往来。持续的经济互动，让两地居民产生了强烈的地域归属感，普遍支持广佛同城化融合发展，在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问题的融合诉求强烈（廖开怀，2021）。简言之，生产联结实现了经济互通，是人文共生不可或缺的前置条件。

2.传导纽带：长效协作持续降低交易成本

常态化的生产联结让区域协作从短期单次博弈转变为长期重复博弈，借助信息互通、行为约束、信任积累三重效应，持续降低交易成本，成为连接物质联动与人文融合的核心传导纽带。

第一，信息互通机制消解信息不对称困境，显著降低事前信息搜寻与协商谈判成本。在市场分割的封闭发展环境下，各区域产业与资源禀赋、政府工作效率、市场主体信用等信息呈现碎片化、隐匿化分布特征，天然形成了信息黑洞。市场主体与地方政府开展跨界合作时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完成信息调研、资源匹配、沟通协作等工作，推高了协作前期沉没成本。而长期稳定的产业配套、常态化人才交流与标准化政务信息共享等机制，能够打通跨区域信息流通渠道，让各区域的产业优势、企业信用、政策规则逐步公开透明，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数字共享平台、线上协作系统进一步提升信息流通效率，大幅减少信息搜寻、谈判沟通的前期成本。

第二，重复博弈框架约束市场主体机会主义倾向，有效降低履约监督成本和事后纠纷处置成本。短期单次跨区域合作属于一次性行为，地方政府、市场主体易受到短期利益、单次经营收益驱动，产生恶性竞争、违约推诿、隐形市场壁垒等机会主义行为，由此产生履约监督、损失追偿、矛盾调节等高额后置交易成本。而长期稳定的跨区域生产联结将单次博弈转变为多次重复博弈，各主体的预期收益由单次收益转变为长期合作总收益。出于长期利益最大化考量，地方政府、市场经营主体自发形成行业自律规范，市场合作惯例、政企协同配合等非正式隐形约束机制，同时配合跨区域联合监管等正式制度，大幅降低合作履约动态监管成本，减少违约纠纷和恶性竞争等协作摩擦。

第三，良性协作生态持续积累跨域互信，培育区域社会资本提升。跨区域信任网络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核心软性生产要素，也是建构区域人文共识的前置基础。在信息透明、违约风险可控、协作摩擦较少的低交易成本生态下，不同地区政府、上下游企业、跨域流动社会群体之间的地域猜忌、认知偏见将逐步消解，持续的良性合作互

动不断积累政府与企业、企业之间、群众层面的多层次跨域信任存量。这种依托长期生产互动沉淀形成的全域信任网络，构成区域社会资本的核心，能够弱化行政边界带来的人文隔阂，为后续统一发展共识塑造、人文认同建构提供坚实社会基础，完成从经济层面协作互动向人文层面价值共生的关键过渡。

3.核心内核：社会资本赋能区域人文认同构建

跨区域交易成本持续降低、全域多层次信任网络初步成型，区域社会资本不断提升，这构成了区域人文认同构建的前置条件。当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跨域沟通摩擦等交易成本被压缩至可控范围，区域发展的演化重心将突破物质生产联结的单一维度，实现从生产环节协作向人文价值共生的层级跃迁，进入区域人文认同构建阶段，这也是区域融合摆脱行政外力依赖、培育可持续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节点。人文经济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核心特质在于，其并非单一追求产出增益的工具性行为（魏建，2025），而将经济协作行为视作重塑区域社会联结、重构群体价值认知的核心环节。长期低摩擦、高互信的跨域生产协作生态能够持续消解行政区之间的认知壁垒、利益分歧与文化隔阂，循序渐进催生覆盖政府、市场主体、社会公众多元主体的三重全域统一发展共识，形成层次完整、逻辑自洽的区域认同体系。

第一，全域产业协同共识逐步成型。在行政分割与属地政绩考核的双重约束下，各地方政府往往形成封闭化属地发展思维，倾向于独立布局高回报、短周期的同类产业赛道，最终引发全域产业同质化内卷、资源重复配置、产能过剩等低效发展问题（纪小乐等，2018）。而长期低成本、高信任的跨域产业链协作互动，能够引导各地方政府跳出行政区划视角下的局部利益框架，从全域国土空间与产业统筹视角分析自身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与功能定位，主动退出低层次同质化竞争赛道，主动对接全域产业链分工体系。

第二，统一市场治理共识持续凝聚。行政区经济本质是属地利益导向下的短期治理选择，各地通过市场准入限制、地方性产业补贴、差异化监管标准等隐性壁垒割裂统一市场，本质源于缺乏全域市场共治的价值共识。经过长期的互信协作促使交易成本优化与政府管理透明化，各治理主体能够充分认知分割市场带来的全域资源错配、整体效率损失等长期负面效应，主动摒弃属地市场封闭思维，自发对接统一市场准入、质量监管、信用评价、产权保护等标准化规制体系，协同构建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域统一市场治理框架。这会促进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更加顺畅的流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场治理共识，破除行政边界衍生的市场壁垒，夯实区域一体化的制度认知根基。

第三，人本导向发展价值共识深度沉淀。传统属地发展模式以GDP增量、财税规模、工业产值等为核心政绩标尺，形成重增长、轻民生，重短期、长期缺位的功利化发展价值导向（郭澄澄等，2021）。而人文共生导向下的长期跨域协作，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域民生均等化、区域人文资源共建共享、区域文化传承发展置于重要位置，推动各级治理主体扭转短期政绩单一导向，建立“全域共赢、民生共富、人文共生”现代化发展价值共识，将公共服务一体化、区域文化传承、城乡福祉均衡等人本目标纳入区域融合核心评价体系，完成发展价值范式的根本性转型。这也促使区域边界两侧的民众由交流、交往向交融转变，直至产生区域归属感与地域认同感。

产业协同共识、统一市场治理共识、人本发展价值共识三者相互嵌套、协同耦合，共同构成完整的区域人文共识认同体系。该认同体系的生成重塑区域融合的动力生成机制：以往依靠上级行政指令、阶段性考核任务、政策红利驱动的外部约束型“被动融合模式”逐步被以全域价值共识为引领、以跨域利益共生为纽带、以人文互信为支撑的内生型“主动融合模式”所取代。原本相互独立、存在利益博弈的各行政单元，在区域综合认同的凝聚作用下逐步消解本位分歧，递进形成紧密联结的区域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与发展命运共同体，自发开展长效战略性协同合作，真正实现区域融合内生动力的稳定生成与持续释放。

4.最终形态：人文共生实现全域深度融合

生产联结建立、交易成本降低、区域人文共识构建并非单向线性的递进关系，而是相互反馈、动态循环、持续赋能的有机演化系统。生产联动创造常态化的协作场景，为信任积累与共识培育提供实践土壤；认同形成又反向降低协作摩擦、进一步降低内生交易成本，激励更深层次产业分工与跨域要素配置。三者往复循环、螺旋上升，最终抵达人文

经济学范式下高水平的区域融合状态——区域一体化共生系统。区域一体化共生系统将形成物质经济、制度规范、人文价值三层耦合嵌套的完整有机体系，三层系统相互支撑、互促共进，构成稳态区域融合发展的格局。

第一，物质经济子系统实现高度一体化协同。在全域统一市场框架下，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与数据、碳配额、知识产权等新型要素破除属地流动壁垒，实现自由流转与全域优化配置；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贯通，梯度错位的产业分工格局消解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上下游配套、产学研跨域联动形成常态化机制；统一的市场准入、质量标准、交易规则、监管体系使区域分割、地方保护等显性与隐性壁垒基本消除，全域资源配置效率、产业协同效能跃迁至高水平均衡状态，构筑深度融合坚实的物质经济基底。

第二，制度规范子系统达成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协同适配。成熟的全域融合体系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配套、互补支撑。以法规、规划、联合条例、跨区域监管办法为核心的正式经济制度完备落地，形成权责清晰的跨域治理架构、全域信用监管体系、均衡化利益分配与生态补偿机制。与此同时，以区域文化、合作契约精神、跨域信任、协同共识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同步成型，弥补正式制度难以覆盖的协作地带。正式制度划定协作底线、非正式制度引导主体自觉，二者耦合形成长效稳定的跨域治理运行机制，从规则层面保障区域共生可持续推进。

第三，人文价值子系统形成统一共生发展生态。长期跨域互动消解地域文化隔阂与本位认知偏见，多元地域文化兼容并蓄、共生共荣；多层级跨域信任网络全面覆盖政府、市场经营主体、城乡居民等行动主体，社会资本存量持续提升；全域统一的产业、市场、人本发展共识深度沉淀，价值认知分歧大幅消解，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文发展理念贯穿区域规划、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全流程，构成区域融合稳定持久的精神内核与内生动力源泉。

区别于传统以政策、制度与治理模式等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制度供给、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区域一体化模式，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区域一体化共生系统依托生产联结促使要素自由流动，依托发展价值转向，促使地方政府摒弃“唯GDP、唯增量”的工具理性导向，依托人文价值共识，将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区域发展根本价值旨归。通过三层系统的耦合联动，同步实现经济高效协同、社会公平普惠、文化包容繁荣、生态可持续保护多元发展目标，达成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维协同共进的综合发展格局。这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目标，是高水平的区域协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路径，也是人文与经济相互促进的发展理念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体现。

需要明确的是，“生产联结建立—交易成本降低—人文认同构建—区域深度融合”并非自发成立的单向线性演化链条，生产联结的建立仅为人文共生提供物质载体，二者之间不存在天然正向传导关系。若缺失常态化文化互鉴、全域共识培育的软性引导机制，紧密的产业联动反而可能催生区域矛盾，形成融合进程的反向演进路径。从国内城市群实践观察，同类产业近距离联动极易引发产业同构、招商引资恶性竞争，各区域在产业链资源、政策红利、市场份额争夺中持续产生利益冲突；中心城市依托资本、人才、公共服务优势形成要素“虹吸效应”，周边县域、次级城市长期面临人才流失、产业外迁、税源缩减等发展困境，进而滋生地方发展焦虑，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互信水平持续走低。在此情形下，重复博弈无法催生长期合作默契，反而不断放大机会主义行为。各地增设隐性市场壁垒、出台竞争性补贴政策、限制要素跨区流动，前期搭建的生产联结逐步松散，区域交易成本不降反升，产业联动难以转化为发展共识，甚至由经济协作转向区域博弈对立。由此可见，四阶递进模型属于有条件演化路径，生产联结仅构成融合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文化互通、信任培育、价值引导以及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是阻断反向退化、推动链条正向运转的核心中介变量，唯有同步配套人文共建机制，才能避免产业联动异化为区域竞争，保障区域融合向认同建构、全域共生方向稳步推进。

四、人文经济学视域下区域深度融合的政策建议

立足“生产联结建立—交易成本降低—人文认

同构建—区域深度融合”的区域融合发展逻辑，针对属地思维固化、跨域社会资本匮乏、地域文化认知割裂等现实问题，从价值理念、产业载体、人文互通、信任网络、制度保障五个维度推动区域融合发展。

1.秉持人文经济价值理念，确立区域融合发展导向

发展理念作为多元主体行动逻辑的前置条件，是破解行政区经济、重构区域价值共识的逻辑起点。依托价值理念的系统性转型，树立全域共生、以人为本的新型区域融合发展导向，才能从根源消解地方保护、同质化内卷、短期功利化行为等问题。

第一，重构多维度政绩考核框架，消解属地利益驱动倾向。适度降低经济发展、工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等短期经济增量指标权重，增设区域产业协同贡献率、跨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区域人文共建成效、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度、生态跨域共治成果等长效综合性指标，构建兼顾短期发展与长期共生的复合考核机制。通过制度激励引导地方政府破除行政区本位思维，建立“全域一盘棋”协同治理认知，从考核源头规避招商引资政策内卷、低水平产业重复布局等低效竞争行为。

第二，构建常态化跨域互鉴交流机制，弥合发展认知分歧。搭建多层级城市群协同联席会议、跨行政区干部双向挂职交流、政策对标研讨等制度化平台，建立常态化的发展经验交流、治理模式对标、发展规划联审工作机制。针对数字产业协同、绿色低碳转型、统一市场规则、人文共建等前沿领域设立专项联络机制，持续推动各地治理思维、政策逻辑、发展视野交互融合，逐步消解行政区之间的认知隔阂，凝聚互利共赢、长期共生的全域发展共同愿景。

第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发展标尺，修正工具理性发展认知偏差。在区域一体化规划、重大产业项目落地、跨域公共资源布局全流程嵌入人本发展评价维度，同步测算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人文效益，平衡产业发展、经济增长与民生普惠、文化传承、社会包容之间的关系，扭转“重经济、轻福祉，重短期政绩、长期民生缺位”的功利化发展范式，将全域居民共享发展红利作为区域融合的根本价值归宿。

2.构建区域多层级生产联结，夯实人文与经济共生的物质载体

生产联结是高水平区域融合发展的物质前置场景，持续深化全域产业链、要素链、创业链、供应链四链协同，创造高频次、多层次跨域主体互动机会，为文化交融、信任积累、共识培育提供稳定的平台，打通由经济互动向人文共生的传导通道。

第一，梯度化布局全域差异化产业分工网络，从源头化解产业同质化内卷。在城市群、都市圈层级开展全域产业空间统筹规划，综合研判各区域资源禀赋、创新能力、产业基础、区位能级，构建“中心城市创新策源—节点城市先进制造转化—县域特色配套赋能”梯度化产业分工体系。中心城市聚焦科创研发、总部经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等高附加值环节；区域节点城市承接中试转化、先进装备制造等中游产业；县域立足特色农林、文旅、配套加工形成细分特色赛道。同步搭建产业对接平台，推动上下游企业跨区域配套协作，提升市场主体常态化互动频次，以深度产业联动拓展人文交流场景。

第二，系统性破除要素跨域流动制度性与隐性壁垒，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清理制约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碳资产等要素跨行政区流动的限制性政策和隐性准入门槛。建立跨区域专业技术职称互认、社保医保互通、人才补贴共享、跨域投融资协同机制；依托大数据、区块链数字技术搭建全域要素交易与流转综合平台，推动传统生产要素与数字、碳等新型要素高频双向流动，依托要素跨域流动持续增进不同区域人群、市场主体的常态化交互，为深层认知互通提供基础条件。

第三，统一全域市场规制体系，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生态。统筹整合各区域市场准入标准、产品质量检验规则、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市场行政执法规范，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异地协同监管长效机制，消除隐性市场分割壁垒，从市场运行底层搭建共生协作基础，培育全域统一的市场规则认知。

3.构建深度人文交流体系，消解地域文化认知隔阂

地域文化差异衍生的非正式制度壁垒是内生交易成本的重要来源，需要构建常态化、深层次的人文交互机制，使常态化生产联结产生的互动优势向全域发展共识转化的传导通道，破解人文交流形式化、碎片化、短期化的现实短板。

第一，构建多元主体长效深度人文交互机制。推动跨区域高校智库、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建立长期联合研究平台；常态化实施党政干部、专业技术

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跨域挂职、互训交流；搭建行业常态化研讨对接机制，推动产业认知、治理模式、价值观念深度交融。同时，面向普通城乡居民搭建常态化跨区域交往平台，实现人文交流下沉基层，夯实大众层面共生认知基础。

第二，挖掘区域同源文脉基因，塑造一体化文化标识体系。系统梳理城市群、省际毗邻区共有的历史脉络、民俗传统、方言文化带、饮食文化技艺，整合分散文化资源，培育区域文化共识，实施一体化开发运营。例如，重庆大足与四川安岳的石刻文化协同建设，就是统筹跨区域同类文化资源进行联合规划、联合运营，统一打造全域文化IP，串联一体化文旅精品线路，塑造整体性的区域文化符号。同时强化辖区居民的区域归属感与共同体意识，消解地域文化本位排斥心态。

第三，推进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配置，夯实社会层面融合根基。统筹全域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体育场馆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布局，建立跨区域公共文化资源互通共享机制；统筹全域文旅产业协同规划，打造跨域文旅融合产业集群，以开通年票、通票、高频次短线旅游线路等方式，加强社会公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与文旅体验中逐步形成全域协同发展的集体共识。

4.完善全域多层级信任培育机制，持续降低内生交易成本

跨域信任网络是区域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也是区域融合发展的关键。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协同，持续培育跨域社会资本存量，降低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内生交易成本，优化区域协同生态。

第一，搭建全域一体化信用数字共享平台，破除跨域数据孤岛。整合各行政区政务履约记录、企业经营信用、司法处罚信息，构建全域统一信用数据库，实现信用信息跨区域实时查询、动态更新，从源头降低市场主体合作前期信息搜寻、资质核验、风险预判成本，缓解区域信息不对称困境。

第二，培育长期共生型商业契约精神，持续积累跨域社会资本。充分发挥行业商会、产业联盟的中介载体作用，常态化开展诚信经营、跨域共生交流活动与行业自律建设，引导市场主体摒弃短期逐利的单次博弈思维，主动建立长期战略性跨区域合作关系，在持续稳定的协作互动中不断积累政企、企企、政企民多层次互信存量，提升区域社会资本。

5.补齐人文协同短板，构建区域融合发展共同体

针对当前区域融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供给失衡问题，需要推动经济与人文协同发展，构建区域融合发展共同体。

第一，强化人文融合顶层规划设计。将全域文化共建、跨域信任培育、区域认同建构、人文共生发展等内容全面纳入城市群、都市圈中长期一体化总体规划，配套出台跨区域人文协同专项实施方案，明确人文融合阶段性发展目标、重点实施任务。

第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发展格局，培育区域融合发展共同体。搭建“政府统筹引领、市场主体主导、社会组织联动、城乡公众广泛参与”多层次协同发展体系：政府侧重顶层制度设计、公共平台搭建、跨域统筹协调；市场主体依托产业链联动开展常态化产业与人文共建；高校、行业协会、民间社团等社会组织承接学术交流、文化传播基层工作；广大居民作为人文共建参与主体，依托公共服务、文旅互动、基层交互凝聚全域共识。多元主体协同发力，持续夯实人文共生根基，最终构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经济与人文双向赋能、利益与价值高度统一的区域融合发展共同体。

注释

①大足安岳：《以合作破界　为双城赋能——川渝毗邻地区融合发展的“资足样本”》，2026年6月18日，https://www.txdzw.com/xw/dzxw/content_92263。

参考文献

[1]卢伟，李沛霖.“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进展及“十五五”时期面临的形势和重大任务[J].区域经济评论，2025(2)：36-49.

[2]纪小乐，魏建.行政区划调整如何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动因、类型与方向[J].齐鲁学刊，2019(3)：109-116.

[3]陈尧.再造城市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适应[J].政治学研究，2025(4)：15-29+186-187.

[4]李琳，曾巍.地理邻近、认知邻近对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对中三角、长三角省际边界区域的实证[J].华东经济管理，2016(5)：1-8+193.

[5]陈旭，邱斌，纪展鹏.城市网络嵌入、信息可得性与企业创新边界[J].经济研究，2025(6)：57-76.

[6]安晓明，张可云，刘夏.人文经济学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构建[J].改革，2025(10)：56-66.

[7]赵麦茹，王慧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生成逻辑、主要内容与原创性贡献[J].经济与管理

评论，2025，41(6)：5-19.
[8]罗卫东.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属性[J].浙江社会科学，2025(1)：28-41+156.
[9]魏建.增长共识理论：人文经济学之核心[J].江海学刊，2024(2)：84-91+255.
[10]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11]刘志彪，刘冬惠.分权改革视角下的区域协同融通发展：以长三角区域为例[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4(4)：39-48.
[12]银温泉，才婉茹.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治理[J].经济研究，2001(6)：3-12+95.
[13]丁焕峰，陈庆秋.区域社会资本：一种重要的区域创新动力[J].经济问题探索，2006(9)：24-29.
[14]潘越，戴亦一，吴超鹏，等.社会资本、政治关系与公司投资决策[J].经济研究，2009，44(11)：82-94.
[15]王艳，李善民.社会信任是否会提升企业并购绩效?[J].管理世界，2017，(12)：125-140.
[16]Putnam R D，Leonardi R，Nanetti R Y.，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17]Sterm H H. The cultural syllabus[C]//Allen J P B，Harleg B. Issues and op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2：205-242.
[18]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9.
[19]钟开斌.控制性多层竞争：对口支援运作机理的一个解释框架[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1)：4-14+126.
[20]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7 (6)：91-103.
[21]黄承伟，覃志敏.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J].开发研究，2015(2)：56-59.
[22]廖开怀，符蓝，Breitung W，等.边界融合理论视角下的同城化研究：以广佛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1(7)：115-123.
[23]纪小乐，魏建，李欣泽.撤县设区 VS.切块扩区：地级市扩大市辖区经济发展效应的实证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8(6)：46-57.
[24]郭澄澄，蔡之兵.市场分割、区域不均衡发展与统一大市场建设[J].区域经济评论，2024(6)：38-48.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Realization Path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Regional Development Logic from Production Linkage to Identity Construction

Ji Xiaole　Wei Jian

Abstract：Promoting in-depth regional integration constitutes a pivotal link in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Nevertheless,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rioritizes the alloc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material factors such as capital, land and technology, while generally overlooking the profound impacts of humanistic factors on factor mobility and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Incorporating culture into the economic analytical paradigm, humanistic economics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three dimensions: production linkage, cultural identity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re strengthened through collaborative practices; long-term cooperation eliminates information barriers, restrains opportunistic behaviors, reinforces inter-subject trust and cuts transaction costs, thereby foster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al consensus and ultimately achieving high-level regional integration. This offers a brand-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ackle practical dilemmas including segmented factor markets, homogeneous industrial involution and short-term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on in China. Empowered by humanistic factors, China can gradually shift from administrative-order-driven collaboration to endogenetic symbiotic integration, and ultimately build a cross-reg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centered on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gainst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perational mechanisms, practical obstacle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serves as both an academic necessity to enrich the localized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humanistic economics, and a practical demand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styl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Key Words：Humanistic Economics; Region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Linkage; Cultural Identity

（责任编辑：正　漪）